

*The story about a woman
reporter*

范春歌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梦里没有橄榄树

——
单车西行散记



梦里没有橄榄树

——单车西行散记

范春歌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梦里没有橄榄树
——单车西行散记

范春歌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七二一八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4插页 140000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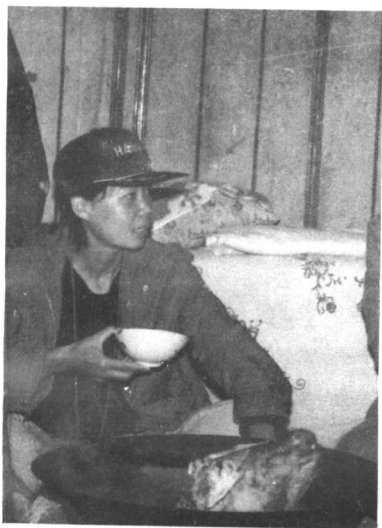
印数：1—5000

ISBN 7—5354—050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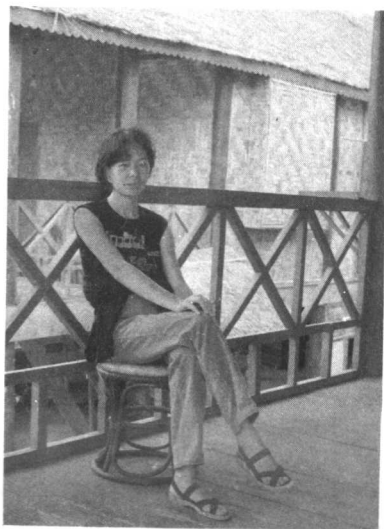
I·435 定价：3.00元



午 餐



好酒！——在蒙古包



云南竹楼小憩



问路



进去看看!



采访泸沽湖畔摩梭老人



彝族妇女裸五与我



过兰州黄河铁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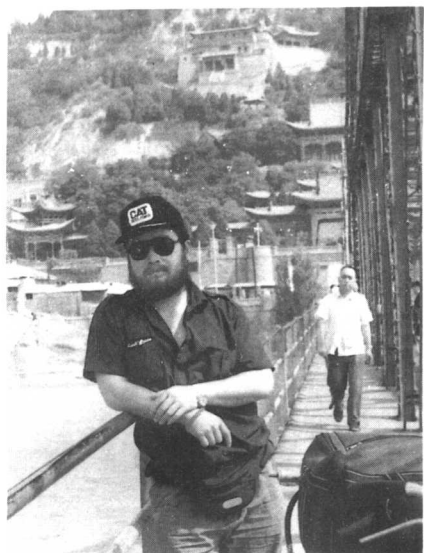
路边打盹



与拉卜愣喇嘛们交谈



穿云海——川西高原



丈夫段志民



再见，乌拉特草原

——瞬间成为永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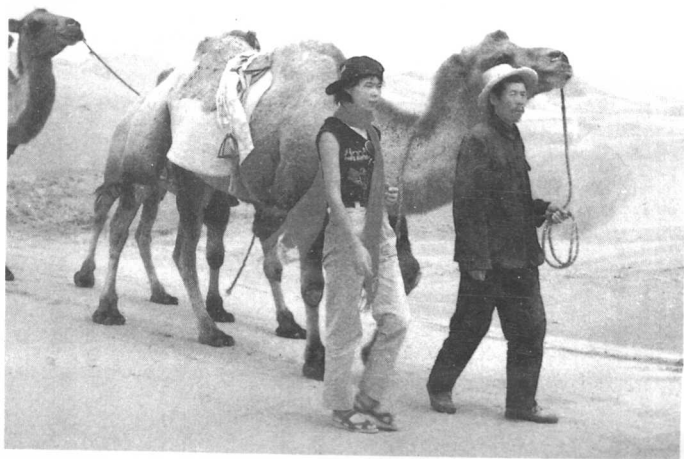
——抵达目的地中蒙边境295号界碑



二郎山，我来了！



过
腾
格
里
沙
漠



内 容 提 要

西部永远是个诱惑。对女性亦然。

本书作者由当钳工的大胡子丈夫陪同，于1989年骑单车穿越中国西部，进行了一次行程近万里时达三月的艰苦采访。

他俩历尽艰辛翻越过以险峻闻名的二郎山，在若尔盖大草原曾被牛犊般的牧羊巨犬群围困，险些被撕碎，因极度干渴几乎倒在人迹罕至的茫茫戈壁之中。死亡的数度考验使他们体味到生的庄严。而甘肃乡野小店偶遇神秘的西班牙女郎、滇西泸沽湖畔“女人国”里作客……又使这次险情丛生的采访之旅充满极浓的传奇色彩。

当我重新穿过闹市的人海去报社上班的时候，那些穿越百余华里戈壁荒漠，有时仅能见到一只秃鹫的日子，仿佛成为另一个世纪的经历……

题 记

我说，我要骑单车穿越中国采访。

这是1989年5月的事。

在我向报社递交请示报告之前，我已悄悄地“读”了一个月的地图。它们大大小小铺满了我的卧室，以至朋友们串门，笑称这里象座作战指挥部。我说，对，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

请示报告是在一夜写好的，而那个愿望却萌生已久。从我在《西行漫记》中认识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的西北角》中认识范长江的时候。后来，还“认识”了徒步采访长征路的记者罗开富。

西部那块高高翘起的板块，无论昨天和今天，永远有一种神奇的诱惑。我觉得这块土地挺“中国”。

可做一次纵贯它的采访之旅，对我来说一直只是个愿望而已，谁没点信马由缰的想象呢！

直到那天，我借来一本英国人写的《撒哈拉游记》。叙述的是作者本人为了了解世代繁衍其间的游牧民族的风土人情，选择前人未曾涉足的线路，以骑骆驼为主，深入沙漠腹地考察的故事。

这位名叫理查德·特伦奇的探险者在书中说：

“十一年来，我不止一次地筹划着可能的旅行，用铅笔

在想象的地图上划着莫名奇妙的标志，安排毫无意义的旅行时间表。我并不急于实现自己的理想。年轻人华而不实的生活似乎永远没有尽头。后来，我在北爱尔兰当了三年的新闻记者，我认识到，现实存在着一线希望，而未来仅是一种可能性。

“我已经二十五岁了，青年时代的光阴正从我身边悄悄溜走。我的面前是一条不祥的分界线，越过它，未来就变成了枯燥无味的循环往复。我想象自己已到中年，因为渴慕本来可以实现的目标而忍受精神上的煎熬……”

读到这里，我无法无动于衷。我整整三十岁了。这个年龄对女子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恰在此刻，缄默已久的武汉关大钟在五月的晴空下久久回荡起来。时光并非无声地流逝。报社与长江近在咫尺，进编辑部六年来，日日面对大江东去，日升日落，只到此刻，方有所顿悟。

我听到一种召唤。

放下这本英国人的书，穿过被行人挤得几乎水泄不通的江汉路，走进新华书店买了一摞地图册。

骑单车，是一种方便自如的旅行采访方式。我选择它后，又把出发时间订在六月。这个季节使我不必携带沉重的保暖物品，白天一套短裤短衫亦足矣。采访路线，我则考虑大陆的东西跨度大，且已有许多勇士“长漂”“黄漂”时考察过。便选择了从中越边境出发到中蒙边境结束这种自南向北纵贯中国大陆的旅程。这条线路南北跨度不大，时间所需不会太长，穿过我国西南西北，地理环境很有特色。有云贵高原、川西高原、成都平原、黄土高原、内蒙古草原等，全程经云

南、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等省、区，还有苗、壮、彝、藏、回、蒙等十几个少数民族聚居区，采访内容也是丰富的。尤其是我沿路将经过红军长征时经过的许多地方，还有我的父母在战争年代背着背包和枪徒步行军的故地……

请示报告交给了《武汉晚报》编委会。

在等待批示的日子里，我唯一要面对的就是爱我的父母和丈夫。

这毕竟不是一次轻松的郊游。谁也无法预见这场远行的结局。

“你疯了！”我丈夫自然是最早知道这事的。

那天在中山公园的自贡灯会上，我拉他离开人海灯海，郑重地向他宣布一件积蓄已久的秘密，或者说决定。他误解了我的眼睛——以为我将告诉他，打算要孩子。

在公园的石凳上，夜色里我划了一道谁也看不见的路线。只有我清楚。

他抚了抚光滑的石凳：“你知道这条线是什么？”

我懂。它意味着我不曾谋面的高原。还有别的。

丈夫虽在一家工厂当钳工，可他插队时开过拖拉机进大山拖柴，见过断魂坡、死人坡、招魂崖……

于是，他的第一个反应便是我前段所说，以为我又是心血来潮，信口开河。曾有一回，我说想从飞机上跳一次伞，电视里伞花悠悠地飘在碧空中实在诱惑。到处打听跳伞的门路，只因伞兵制度严格才作罢。

这回，我心似铁。

他气冲冲地给我准备单车配件，气冲冲地系着围裙下厨，给我“营养营养”。他甚至希望出点车祸，撞伤一条腿

或胳膊什么的，把这件“耸人听闻”的事阻止住。

在我走火入魔般忙出忙进准备西行的日子里，父亲躺在病榻上忧郁地望着我。他深知我的懦弱。每次我去医院打青霉素针，全家人都要给我饶半晌口舌。且每回打针，都因胆小遭医生奚落。丈夫怕我跑，打针时堵在注射室门口虎视眈眈地守着。

懦弱的我却偏偏常做些不安分的事教家里着急。姥姥说，我小时候在山西汾河边的老家，有个晌午，悄悄搭村里车把式拖煤的胶皮轱辘大车出了村。姥姥和舅舅们搅动村里人，疯似地寻了一个下午，门前那条小河也摸遍了。

黄昏时，我才兴高采烈地出现在近乎绝望的家人面前。

这是我第一次“远征”。5岁，离村口12里。

父亲的忧虑直到那天——武汉夏季的大雷雨来了。天摇地动的。我淋成水鬼似地来到父亲床前，他问，我怎么回来的？我绞着湿漉漉的头发说，骑车从长江大桥过来的。

“好，我放心了！”父亲拍了拍床头。

我母亲是一位老新闻工作者，她最理解我。可是，当我们总编辑考虑到各种因素，要求她和父亲在我的请示报告上签名时，母亲仍和父亲商议了整整一天一夜，最后提笔给组织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表示对我的理解和赞同。

当我看到母亲流畅的字迹及父亲在信尾用不太灵便的手签上的歪扭却极认真的名字时，泪水夺眶而出！

这时的我该是天下最幸福的孩子！

晚报编委会与此同时召开了专题会，严肃认真地讨论了采访计划的可行性，决定给予我全力支持。

上报《长江日报》总编辑叶子健同志，得到赞同。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杨振兴同志批示：“纵越西部采访之行，是报社也是我市新闻界的一个壮举，请予全力支持，周密安排。”

为了确保我此行安全，报社同意我丈夫段志民随行，并从公安部门借来一根高频电警棍，以作防卫之用。广告科曾与一自行车生产厂家联系赞助事宜，而厂家以局势动荡此行生死难卜为由谢绝。武汉市金属家具工业公司却在此时给予资助，我每念于此，心中充满感谢之情。

五月三十一日，晚报为此行举办了新闻发布会。

会后，我离开闪个不停镁光灯和转动不休的摄像机，到总编室向满头华发的贺老总告辞。

“平安回来！”他握住我的手，“还是那句老话：鸡鸣早看天，未晚先投宿。”

一分钟前，在所有来宾面前很自信的眼突然湿了。我不想让这位可敬的老人看见我的泪，背过身匆匆奔出了门。

没有手帕，袖口揩得水潋潋。如果任何一位同行此时在楼梯口碰见我，都会大为扫兴。因为，在人们眼里，一位雄心勃勃异想天开的女人不应如此。

西部不相信眼泪。

我抹干泪水，离开已空空荡荡的大楼。街上有人用嘶哑的喉咙在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报社那栋灰色的大楼离我越来越远。但我明白，不论走到天涯海角，它永远立在我身后。

当夜10时，我和丈夫小段去武昌南站办理单车托运手续。因为骑车出发地点是云南老山，这样，还需先乘火车到昆明。

小段去交涉托运事宜，我在一只空木箱上坐着等。一会

儿，他脸色不悦地回来了，原来办理托运的一位老头说我们来迟了，必须给搬运工“意思”一下才行。

我发愁地望着他，不知道这个“意思”该多大？100元？200元？

小段说他去想办法。

我趴在齐胸高的托运室窗口往里看，几个女人正用筷子争先恐后地夹出一只罐头瓶里的泡菜。其中一位详尽地介绍泡制方法。一股麻油香飘来。

我听着那一道道复杂的工序，忽然才觉得这个轻松舒适的世界虽和我一墙之隔，却是遥远了。

有人在灯下转动着泡菜瓶，那些蒜头在溶液中呈一瓣瓣金黄，挺好看。

讨论完泡菜，女人们又抓起桌上一张当日晚报。

“……女记者范春歌将骑单车穿越……”一个胖胖的妇女念道，声音从未关闭的传唤喇叭里传出来。

我赶紧缩回脑袋。

小段来了，他拿了五盒“阿诗玛”，强装笑脸去给搬运工“洒”烟，老头儿摸了二盒在裤兜里，脸顿时柔和许多。

我的脸色很难看，小段安慰我：“别大惊小怪，我见的多！”还未上路，就给人“宰”，漫漫长路，经费有限，又没揣聚宝盆！心，竟灰灰的，少了些兴奋。

“范春歌，交托运费。”喇叭里传出的声音，很特别。

几个女人，脑袋毛发蓬松地挤在窗口，看我走近来。

“喂，你出去跑怕不怕？”有个问。

我笑了。

“那个大胡子男的是你爱人吗？我们还说你找了个老

外，蛮有福气咧。”又有个指指柱头下的小段。

我把钱递过去时，一个年纪大些的突然问：“你们出门了，小孩那个带？”

“我没小孩。”

一阵沉默。“要走那么远的路，要当心啊。”她们很诚挚地盯着我。

“是的。”我低下头，嗓子有点涩。不知怎么，被人“宰”的不快又消失了。

凌晨三时，母亲为我在干休所订好的小车停在了院里。临出门，母亲发现我的裙子背后一颗扣子松了，执意要缝好。

我知道，一旦骑上车就会换长裤的。可我乖乖地不动，听任母亲取出针，一针针在我身后缝。屋里静得听得见针线穿过布裙的声音。

“妈，我想托你一件事。”我终于打破缄默。

母亲抬眼看看我，等我说。

“这里有一张照片底版，我比较喜欢，将来有什么事需要，就用这张好了。”

那张照片是我四月过三十岁生日在北京照的。我照相极少笑，但那张看去，还算美丽。

母亲接过底片，没有说什么。她完全理解我的意思。

我耽心途中万一出事，报社要照片开追悼会什么的，家里人着急，胡乱翻一张送去，形象欠佳，挂在那里，我会死不瞑目的。

如果说，我安排了什么“后事”，这就是唯一的一桩。别的没细想。

在我登上车的一霎那，回过头，母亲站在星光下，夜风撩起她的头发。

我突然想仿照电影里常见的游子离家的场面，给母亲跪下，感谢她三十年的养育之恩，请求宽恕性格倔强的我给她惹的一切烦恼。

可我什么也没做，也没说。

母亲明白什么在等待着我。

我明白我把什么留给了她和父亲。

院里只有一盏灯亮着，那是父亲的屋。因为手术后卧床多年，他无法下床送我。万语千言便聚在他特意为我拉亮的灯里了。

月台很清冷。凌晨时分的车次是没有什么人送行的。有妹妹春雨和她的男友送我。

其实，这种简单倒更适合我。

我们相对无言，所有要说的几天来已说完了。在昨夜的音乐茶座，人称“小苏芮”的她，专为我唱了首《大约在冬季》。“没有你的日子里，我将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

那座大厅里的所有人，不知道这首歌是唱给一个“不知何时归故里”的女子，一个我听的。

当列车启动的一刹那，妹妹突然拉住我的手：“姐姐，你们可要平安回来！”泪水从她美丽的脸颊瀑布样泻下来。

我的对座认出这位电视节目主持人，不由惊愕地问我：“你们要上哪儿？”

望着妹妹边跟车跑边挥手，我泪眼模糊了。

黎明到来之际，我沉沉地睡去。